

“叙述危机”与“慢新闻”*

王 强

摘要：大数据强化了互联网时代传统线性叙述的危机。在互联网时代，重构文化共同体显得尤为重要。媒体对信息的加工处理以及改进叙述的努力，可以有效地应对当下的“叙述危机”。“慢新闻”试图通过主打深度报道、回归传统叙述之路来进行突围，受到有识之士的积极推崇和实践。“慢新闻”有利于“新闻经典”的建构，因此被视为应对这一危机的有效理念。

关键词：叙述危机，数字叙述，新闻叙述，慢新闻

“Narrative Crisis” and “Slow Journalism”

Wang Qiang

Abstract: As big data have strengthened the crisis of traditional linear narrati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cultural community has becom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he processing of information by the media, together with an effort to improve its narration, can hopefully address the present “narrative crisis”. Furthermore, “slow journalism” can be considered an effective concept in answer to the crisis.

Keywords: narrative crisis, digital narration, news narration, slow journalism

DOI: 10.13760/b.cnki.sam.201601012

一、“叙述危机”：“叙事结构崩塌”与受众叙述的自主性

“大数据”（Big Data, Massive Datasets）是描述这个时代的一个炙手可热

* 本文为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受众转向’背景下的新闻叙述研究”（JAS150350），闽南师范大学2015年度校级教改项目“当代新闻叙述的新进展与课程教材建构之研究”（JG201538）成果。

的关键词，围绕它的理论阐述和应用实践不断涌现，方兴未艾。一些人认为“大数据”将大大改写人类处理与传播信息的方式和习惯，并预示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大数据聚焦“相关关系”而忽略其背后的因果关联，其必然后果是对线性叙述传统构成挑战。这也是一些论者批判部分数据新闻轻视甚至忽视叙述的重要根据。事实上，数据新闻只不过进一步强化了数字时代新闻报道的某些特征。在数据新闻出现之前，线性叙述传统在新闻报道中早已面临危机。道格拉斯·洛西科夫在《当下的冲击》(*Present Shock: When Everything Happens Now*)一书中对此有过深刻的分析。他认为人们的时间观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21世纪可以被定义为“当下主义”(presentism)：“人们会将重心转到当下这个时刻、现场体验以及当下最值得关注的东西上来。……我们的文化就变成了人人都在试图抓住流逝瞬间的嘈杂状态。叙事结构和目标已经让位给对现场和即时的曲解。”(洛西科夫，2013，pp. 23–26)具有煽动性的真人秀场景、24小时滚动播报的极端新闻场景、实时体验的电子游戏，都解构了传统的线性叙述，导致“叙事结构的崩塌”(narrative collapse)，造就了“一个不再熟悉的世界”。洛西科夫由此将当代流行文化命名为“现在式流行文化”(Now-ist Pop Culture)。这种流行趋势预示着“叙述危机”的加剧。

传统的线性叙述逻辑连贯、秩序井然，确立了故事讲述者的权威控制和主导地位：“传统上认为叙事线条的组合，依据的是有关开头、中部和结尾的一体化概念，以及内在的根据、情理或者真理。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确定了这些概念，它们在我们的传统中经久不变。‘逻各斯’(logos)这一希腊词所涵盖的正是这些概念。”(米勒，2002，p. 47)线性叙述清晰地传达了所谓的真理价值观，建构了意义秩序和所谓的“宏大叙述”，保证了故事讲述者的特权。相对而言，故事接收者是被动的，他们无法逃离叙述的这一线性秩序和框架。传统新闻业由媒体把控，呈现为一种“托管模式”，受众的主体地位无从谈起：“由于公众没有能力直接捕捉新闻，因此只能等精英阶层将所有信息及其内涵打磨成一个个简单又顺耳的故事后，再传达给他们。按照这种逻辑，公众也没有资格作为知情者参与民主活动。”(洛西科夫，2013，p. 40)由此可见，受众对线性叙述的依赖也是一种规训的后果。互联网的崛起，释放了信息生产和传播的潜能，拓展了个体参与故事讲述和意见表达的空间。数字媒介的互动性削弱了传统故事讲述者自上而下的叙述控制，赋予受众参与叙述的自主性，并由此产生了纷繁复杂的叙述结构和故事形态。后现代语境下信息传播的碎片化、去中心化，不断消解宏大叙述，使得线性

□ 符号与传媒（12）

叙述传统日益式微，利奥塔所谓的“叙述危机”不断深化。

互联网让每个参与者掌握了发布信息的权力，即时刷新的社交媒体，第一时间上传的各种信息和见闻，使得一切都似乎触手可及，令人产生时空凝缩的幻觉。每个“活在当下”的个体都试图成为新闻事件的见证者和亲历者，每时每刻都在密切追踪事件的动态瞬间，试图获得一种即时的、身临其境的体验。连贯的情节重组被放弃了，世界呈现为一幅动态生成的拼贴图景。“故事必须遵从某些约定俗成的情节设定模式，以便让观众觉得合情合理，但现实却不存在这一掣肘。事情就那么发生了，几乎没有什么时间表可言。”（洛西科夫，2013，p. 10）没有经过新闻媒体的挑选、过滤和情节编排，受众得以直面原生状态的现实事件。

电视遥控器的发明同样给予受众自主权，让他们得以逃离故事讲述者的控制，摆脱线性叙述时间轴的约束：“由于逃离能力增强，你的容忍度也下降了。正因如此，现在的电视观众会从一个节目跳到另一个节目，忙着捕捉那些重要时刻。……经由这种解构方式，电视节目失去了按照时间线索讲故事的能力。”（洛西科夫，2013，p. 16）频繁地换台，使得观众接收的信息支离破碎，只剩下一堆残缺不全的故事片段和没有内在关联的电视画面。而且，互联网丰富开放的信息资源，剥夺了传统媒介的信息垄断，快节奏的生活使得年轻一代难以耐着性子倾听传统媒体有条不紊讲述的线性故事。

大数据的逻辑进一步放弃了对事件之间因果关系的追索，由带有专断色彩的、不容置疑的数据直接得出结论，直接剥夺了媒体对新闻事件深度意义的解读。对此，新闻学界的质疑和批判声此起彼伏。有论者认为，相关关系取代因果关系，是大数据与新闻报道之间的首要矛盾：“现在大家都在强调大数据的核心价值是相关关系，甚至于颠覆了因果关系，反而是数据时代变成了碎片化和浅阅读，缺少了深度。然而如果不把因果关系考虑进去，数据对于新闻报道来说就没有意义。”（杨雅，2014）大数据给新闻叙述带来的挑战，是“叙述危机”在新闻领域的新表征。学界对传统新闻报道内涵和深度的重视，也是在为缓解和规避这种“叙述危机”作出努力。

传统叙述结构的崩解的确给受众带来了自由，但与此同时媒体需要面对故事退出后如何吸引受众注意的问题：“几乎流行文化的每个部分都在努力从传统叙事结构中解脱出来，但同时也承受着在没有叙事的情况下仍要制造出类似轰动效应的压力。……如果故事本身和当下主义文化互不相容该怎么办？届时我们又该如何保持生活的方向感和意义？更重要的是，我们首先应该如何面对失去所有这些故事的创伤？”（洛西科夫，2013，pp. 33 – 34）为

应对这一问题，不同类型的媒体提供了不同的解决方案。而一些应对策略彻底背离了拯救“叙述危机”的方向。24小时直播的电视新闻，让CNN模式一度备受关注，以至于产生了所谓的“CNN效应”。这种即时新闻素材的直观呈现，对传统电视新闻叙述带来极大冲击：“就像其他从沉迷于媒体叙事中逃离的模式一样，19世纪80年代CNN的成立和扩张似乎把我们从叙事模式中解放了出来。我们不再通过那些被广播电视台精心包装过的故事来获悉一天的新闻，我们现在能通过现场素材了解世界任何地方发生的任何大事。”（洛西科夫，2013，p.41）现场直播模式大大提升了新闻的时效性，减少了新闻后期叙述和编辑环节，也避免了意识形态话语控制和新闻审查干预的问题。新闻现场的震撼画面带给受众极大的情感冲击，造成一种轰动效应，由此填补了故事退场带来的空白。在视觉文化时代，电视直播显然更具优势，这也是电视新闻因应“视觉转向”的必然选择。

与电视着重视觉冲击的策略不同，社交媒体以形制短小、反应迅捷的“微叙述”取胜。微博和微信上实时刷新的状态、及时传递的即时消息，都在强化着“当下主义”。透过随身携带的智能手机的屏幕，我们可以轻松掌握世界各地的突发新闻，分享亲友的所见所闻。只不过，这种“微叙述”大多是即兴书写、杂乱无章的。这种文本对现实世界的描述与再现是碎片化和浅表化的，给人留下的是稍纵即逝的肤浅印象。

“叙述危机”体现出传统媒体在信息发布以及话语权等方面“失控”：数字媒体技术为受众打开了直接快速获取信息的通道，受众无须听任媒体摆布并接受其对新闻事件的情节组合与解说。正如多米尼克·吴尔敦（Dominique Wolton）在《信息不等于传播》（*Informier n'est pas communiquer*）一书中指出的，“信息”与“传播”之间存在一种悖论：“以更均衡的方式、更加快速地传播更多的信息，并不会增强传通和相互理解。各种受者，也就是不同的个人、不同的民众，一直在抵制那些干扰了其生活的信息，并一直希冀拥有自己的世界观。无法传播（incommunication）成为传播的另一面，它迫使人们不断地协商，以达到共处的目的。”（2012，p.10）受众对那些可能含有诱导和操控意味的传播活动心存疑虑。这也是线性叙述遭受质疑的重要原因。但是饱和与泛滥的信息，更容易让人无所适从。价值观念的分歧和标准的差异化，加剧了传播与沟通的困难。因此，应对“叙述危机”其实是要在消解宏大叙述之后，重构意义和文化共同体，促进传播与沟通的实现。

二、“慢新闻”：回归传统叙述与文化共同体的重构

互联网引领的时代堪称“快时代”，传统的线性叙述显得与这个时代格

□ 符号与传媒（12）

格不入。传统纸媒显然无法与新媒体在新闻时效性上争胜，唱衰纸媒的论调早已不新鲜。不过，正如吴尔敦所言：“信息不等于传播”，传统媒体在促进个体的沟通、分享和共处方面，仍然大有可为。“今天的信息如此浩如烟海，搜寻和发送信息的技术相对而言变得不如以前那么重要了，而重点则转向了培养使信息产品更吸引用户和让他们更满意的能力。”（迈耶，2007，p. 244）实践证明，“技术至上论”无法解决人类的文化沟通问题。在互联网时代，重构文化共同体显得尤为重要。媒体对信息的加工处理以及改进叙述的努力，可以有效地应对当下的“叙述危机”。

为了在这个浮躁的“快时代”求得生存，一些媒体反其道而行之，标榜“慢新闻”的理念，试图通过主打深度报道，回归传统叙述之路来进行突围。美国《时代》杂志创办人亨利·卢斯（Henry R. Luce）将新闻分成“快新闻”与“慢新闻”两种：“快新闻”是某时某地发生了某些事情，用最快的速度作一简略报道；“慢新闻”则是用较长时间，对某时某地发生的某事作深入调查，弄清来龙去脉，分析前因后果，是一种有分析、有深度的形象化新闻。卢斯断定，“慢新闻”比“快新闻”更容易赚钱，因而《时代》周刊的任务就是“为慢新闻提供更广阔的空间”，也即以“慢新闻”作为主打产品。（艾红红，2010）简而言之，“快新闻”传达的是纯粹的信息（message），而“慢新闻”则注入了记者的主观阐释，因而具有人文意涵。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也可以对应于吴尔敦的“信息”与“传播”的关系。事实上，对数据新闻中“数据”与“新闻”的关系也可作如是观。片面夸大大数据的作用，其实也是一种“技术至上论”的表现。吴尔敦主张反思信息的地位，认为可以将“时事信息”归类为“坏信息”，而将那些“可以提供另类人文观和世界观”的信息归类为“好消息”。为此，记者在信息传播活动中的作用应当加强：“拯救信息，就是要反对直播的理念，提升记者的另外一种作用；就是要重新植入信息所反对却必须找回的一切，即时间与缓慢节奏、资料编辑与记者的中介作用，以及有效知识的分拣和传播。缓慢的节奏才是人的时间，而速度是技术的时间。”（吴尔敦，2012，pp. 48–49）吴尔敦的这段阐述与“慢新闻”的理念如出一辙。在“慢新闻”实践中，新闻叙述中的一些变化值得重视：“以往的新闻多注重结果和事件，现在的新闻越来越注重过程和事件中的人，新闻过程化和新闻人文化成为与时俱进的新闻观。有时，报道突发事件，选择‘慢视角’，把镜头‘偏向’过程和人，也会更有冲击力。”（汪秋萍，2013）

“慢新闻”的理念已经得到一些有识之士的认可和推崇，在新闻业界出

现了不少积极的响应者和实践者。《南方周末》资深编辑傅剑锋认为，互联网与传统媒体对新闻的定位不同，前者将新闻制作成“速食品”，后者则可以将新闻打造成“奢侈品”。《南方周末》的许多报道都是以“慢”取胜。英国有本创刊于2011年的杂志叫《延迟满足》（*Delayed Gratification*），它的母公司名称就叫“慢新闻公司”。这本每一季出刊的杂志号称是“最后一个报道即时新闻”的媒体，它报道的不是“新闻”，而是三个月甚至更久前的“旧闻”。《纽约时报》前任总编辑艾布拉姆森（Jill Abramson）专门创立媒体公司，发起所谓的“慢写运动”（Slow Writing），以每篇十万元的稿酬，资助记者撰写每篇至少两万字左右的新闻报道。（王健壮，2015）记者玛利亚·凯瑟琳（Marie-Catherine Beuth）认为，在信息流中错失优秀新闻是令人遗憾的事情，所以她致力于研究如何以“慢新闻”实践去弥补这一缺憾，并创办了专门的网站“Slow News Movement”（<http://www.slownewsmovement.com/>）。如今在美国出现了不少“慢媒体”，比如NOD应用程序、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的Mashcast应用等。目睹眼下“慢电视”“慢新闻”盛行的风潮，有论者因而断言：一个“慢时代”已经来临。（腾讯新闻，2015）

此外，“慢新闻”的实践有利于“新闻经典”的建构。新闻是时间的“易碎品”，记者对时效性的考量往往压倒了建构经典作品的意识。事实上，时效性越强的新闻文本越难以获得经典定位。而那些讲求叙述技巧的、审美属性突出的新闻作品更容易在新闻史以及经典文本序列中争得一席之地。比如，在借鉴文学叙述手法的“新新闻主义”运动中，就诞生了《冷血》（In Cold Blood）、《夜幕下的大军》（The Armies of The Night）等一批青史留名的新闻作品，也成就了汤姆·沃尔夫、杜鲁门·卡波特（Truman Capote）和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等著名作家。相对而言，“慢新闻”倡导者更倾向于打造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经典作品。《南方周末》的傅剑锋就有这样的“经典焦虑”：“我经常自问的是，《南方周末》的报道与写作，能在热点消退后还被人所记忆与称道吗？能真正为记录、解释这个时代提供有分量的东西吗？能把‘易碎品’做成经得起时间与思想考验的东西吗？能留下与这个时代交相呼应的新闻作品吗？”（2011）作为时代记录的新闻经典，传达出普适性的价值观，承载着深切的人文情怀，镌刻着人们的文化记忆，可以有效地促进文化认同，建构“想象的共同体”。从这个意义上讲，新闻经典与文学经典的功能和地位应当是一致的。

总而言之，当代新闻领域的“叙述危机”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而应对这种危机的努力也在不断取得新的实绩。在新闻史上，人们对叙述的认识

□ 符号与传媒（12）

并非一成不变。新闻业内部始终充满矛盾对立的要素，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新闻叙述的实践呈现出丰富驳杂的样貌。在人文和社会学科普遍出现“叙述转向”的语境中，新闻业的叙述实验不会中断，回归传统线性叙述的实践也将持续推进。可以肯定的是，新闻叙述学需要处理的议题注定是层出不穷的。

引用文献：

- 艾红红（2010）. 新闻周刊的立身之本在于“慢新闻”的深度和高度. 中国社会科学报，5月4日第17版.
- 傅剑锋（2011）. 奢侈品 慢新闻 创新力——传统媒体选题与发展的独特之道. 中国记者，5，70－71.
- 洛西科夫，道格拉斯（2013）. 当下的冲击（孙浩，赵晖，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
- 迈耶，菲利普（2007）. 正在消失的报纸：如何拯救信息时代的新闻业（张卫平，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
- 米勒，J. 希利斯（2002）. 解读叙事（申丹，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腾讯新闻（2015）. “慢时代”来临，慢风潮正席卷媒体圈. <http://news.qq.com/a/20150422/055320.htm>.
- 汪秋萍（2013）. 新媒体时代，慢新闻的力量. 传媒观察，8，45－46.
- 王健壮（2015）. 慢新闻的第一道曙光. 联合报，3月17日.
- 吴尔敦，多米尼克（2012）. 信息不等于传播（宋嘉宁，译）.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 杨雅（2014）. 大数据分析与可视化技术：新闻传播的新范式——“大数据与新闻传播创新”研讨会综述. 国际新闻界，3，161－168.

作者简介：

王强，闽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传播学与符号学。

Author:

Wang Qiang, lecture of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Minnan Normal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fields include communication and semiotics.

Email: wangqiang5000@sina.com